

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

余子侠

内容提要 在日伪统治时期,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不仅开办极不景气,其整体类型呈一种马鞍型,而且从其办理过程和开设内容来看也极不平衡。尤其就职业教育的内容而言,在机构类型上明显偏重于农业职业教育的开办,在课程安排上则日语、日文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职教机构的教育与管理上大多为日本人所把持。由此可见,这种奴化教育无外乎养成能听应日本人需要的奴化人才,以实现“日本工业、华北农业”的侵华战略目的。

关键词 日伪统治 华北沦陷区 职业教育 奴化教育

在日本侵华时期,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所经营的职业教育,是整个中等教育领域内最不景气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教育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一样,无论从其开办的过程、开办的种类以及施教的内容来看,无不体现出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教育的真实奴化本性,反映出日本欲将华北地区完全改变成自己的殖民地的险恶用心。

—

从其开办过程来看,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就其办学数目而论,处于一种马鞍形的设置状态。即战争初起时,既有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5 年度科研项目“日伪统治下华北沦陷区的奴化教育”课题研究成果。

的职业教育机构尚能保持一定的办理规模,但在日伪的摧残下,当华北伪政权对学校教育进行所谓“恢复”之时,各地原来的职业教育机构反倒大为减缩,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寇欲将华北沦陷区变成自身战争后方基地,尤其是为了增加农业粮食生产以供其军需,职业教育机构又渐有添增。不过,这种马鞍形办理状况,是就整个华北沦陷区职业教育机构的开办总体数额而言,然而结合各省市职教机构的设置现状,华北沦陷区于战争初期职业教育尚显示出一定的规模,主要是平津地区尤其北平市辖区内战前就已开办的职业学校还基本存在,太平洋战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添置,则主要是农业地区即华北各省伪政权增设了一些农商尤其是农业职业学校,而使职教机构在数目上有了一些添加。现借助其时的有关资料,将这种马鞍形办理状态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战争爆发后,华北沦陷区的职业学校,借助战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惯性,于战争初起阶段尚存有一定数目的学校在继续办理,这些学校主要是开设在北平市辖区内的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机构。据敌伪留下的有关材料,即1938年由所谓“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编印的《北京市各级中小学调查》所示:“去岁事变(指七七事变——引者注)以后,现有之职业及商业学校,省立者一所,市立者有五所,私立者计有六十八所。”^①在这74所职业教育机构中,真正算得上是七七事变后“创立”的职业学校,只不过12所,而且基本上都是“私立”,其中数所的“创立人”或“校长”多多少少都与日本人有一定的关系,现将这些职业教育机构开列如下(见“表一”):

^① “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编:《北京市各级中小学调查》(1938年),转引自田红、李诚编:《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34页。

表一:七七事变后一年间北平市新设职业教育机构一览表

校名	开办时间	创立者	教学科目	学生人数	备注
北京市当业公会 附设日语传习所	1937.10	当业公会	日文专科	58	*“校长”杜善斋, 系“当业公会主 席”
私立新光学院	1938.4	(日)田中武	日文专科	80	*“创办人”田中武 系日本京都人 氏,“校长”许宗 山曾在日本早稻 田大学修业
私立新民报社附 设新民日语学校	1937.12	伪新民报社	日文专科	239	*“校长”系日本人 武田南阳
私立日语簿记讲 习所	1937.10	韩白秋	日文、簿记	24	初设于1923年 9月,后因故停 办,嗣于1937年 10月复办
北京特别市国术 馆附设日语传习 所	1937.11	伪北京特别 市国术馆	日文	8	*“所长”吴彦清
私立新亚学校	1938.春	孙汉沧	国文、日文、 英文、数学、 物理、化学	104	*“创办人”及“校 长”孙汉沧系奉 天东北大学毕业
私立业勤补习学 校	1938.2	傅振钰	日文、英语、 数学	14	*“创办人”及“校 长”傅振钰曾在 日本关西学院肄 业

校名	开办时间	创立者	教学科目	学生人数	备注
私立力工建筑工业补习学校	1938. 1. 1	邵力工	日文、英文、建筑图案、建筑材料等	2	1937年10月28日呈报设立, 1938年初才正式招生, 因学生仅有2人, 不得已于3月21日停课
北京亚东日华文打字学校	1938. 3. 1	盛曜章	专授日华文打字	28	“创办人”及“校长”盛曜章曾在奉天日华打字学校修业
私立益世国剧学校	1938. 3. 1	张云翔	国文、日文、国剧	31	男生17人, 女生14人
私立中国通背拳术专门研究社	1938. 2	贺振芳	专授国术	20	“创办人”及“校长”贺振芳系“民众教育馆”国术教员
私立东华国术传习所	1938. 1. 11	赵中裕	国术专科	29	系“创办人”及“校长”赵中裕奉“社会局”批准成立

资料来源:《北京市职业学校之沿革》, 田红、李诚编:《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 北京出版社1995年8月版, 第235-291页。

仅从上表即可见, 在战争初起阶段, 虽说日伪控制下北平的职业教育机构尚有70余所处在“办理”的状态中, 但这些职业学校不少是一些与日本有一定关系的人物、团体或机构趁战乱人们求学无门求职无技之机, 借办学来敛财的“应时而起”的学店, 所以有的职业教育机构, 如上表所列“私立力工建筑工业补习学校”, 尚未“生”就已“死”去, 那些“活”下来的“职业学校”, 也大多是凭借其教授日文、日语来招揽生意和谋求生存。与其他常规学校教育有所

不同,职业学校一般是为培养知识性劳动技术人才而开设,且其教育一般是带有某种“定向性”即当社会有所“需”时而且是一种具体的需求时,它才有所“创”即有针对性地创办,所以其时所立的“职业学校”,或者专授日文科目,或是兼授日文日语。也正因如此,在日伪的摧残和统治下,随着北平的经济日益衰败,职业教育也在北平地区日益缩减,尤其是传授工业技术知识技能为主的职业学校,更是缺乏自己的生源和市场而无法继续办理。据日本文化特务武田熙等人的调查统计,到1939年时,日伪统治下北平地区的职业教育机构仅有20校。^①其中还包括新设立的“中央铁路学院”(1938年成立)、“弘毅铁路科职业学校”(1939年5月由“北京市教育局”准予立案)和“北京铁路学院”(1939年4月1日正式成立)。这三所学校的创立,显然是日寇为了加强铁路的建筑和维护急需技术人员而开办。在这20所职业学校中,真正属于工业职业教育机构者,仅有“北京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一所。除了该校的校长自事变以来一直由出身于“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俞大纯充任外,其余19校中,也有不少学校的校长改换成与日本有某种联系的人物来充任。其中如“河北省立女子家事职业学校”的校长崔叔青,系由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的校长,将事变时由美国西北大学毕业的林步随改换成了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王锦第;由“北京艺术科职业学校”改名的“北京美术学校”,则将该校的创办人兼校长王悦之先生撤下,换上了郭淑敏,并补设日籍副校长服部亮英,该氏系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而新立“中央铁路学院”的“院长”,则直接由日本人小林

① 李文海、[日]武田熙合编:《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1940年),转引自田红、李诚编:《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92-304页。

铁太郎担当;其他各校的校长,也大多改换与日本人有一定联系或关系的华人充任。^①

据其时资料反映,即使这些职校,也大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中有几所在统计时已是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如“私立才正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于1939年7月,已经“呈准停办一年”;“私立大良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亦于1938年度“呈准停课”;而新立的所谓“中央铁路学院”,一开始就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56名学生被分成八九个班,其肄业年限,“三四月、五六月不定”。^②及至伪华北教育总署总务局于1940年10月编制“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种图表时,伪北京特别市的中等教育中,“职业学校”一栏仅有校数计10所,其中“高级职业学校”9所,“初级职业学校”1所。而9所“高级职业学校”中,“高级工业职校”2所,“高级商业职校”1所,其他高级职校6所。^③到1941年12月编制“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种图表时,伪北京特别市的“职业学校”已只剩存9校了,其中“特别市立高级职业学校”3所,“私立高级职业学校”5所,“私立初级职业学校”1所。^④

与日伪统治下北平地区职业教育机构在数量上不断减少的情

① 李文禔、[日]武田熙合编:《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1940年),转引自田红、李诚编:《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第292-304页。

② 李文禔、[日]武田熙合编:《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1940年),转引自田红、李诚编:《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95-296页。

③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省市中等教育概况统计分表(北京市)”(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21。

④ “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省市中等教育概况统计分表(北京市)”(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21。

形有所背驰,在华北沦陷区的其他省份中,由于日伪对农业职业教育的开办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对此下文将予以详叙),所以在农业社会的华北各省区域内,职业教育机构的总数在战争后期反倒有所添增,尤其太平洋战争后于“农业职业学校”方面更是这样。如在华北地区沦陷最早的冀东地区,在其沦陷之初,日伪对职业学校尤其初级职业学校,尚注意设立,然而到七七事变爆发时,整个伪冀东政权控制区域内的职业学校,就只有开设于通州的“一个初等农科职业学校”了。^①这种状况,到太平洋战争后有所“改观”。据伪冀东特别区于1944年向伪华北政府申报的有关材料,为了“达到决战教育体制”,其地其时已有职业教育机构计共9所。其中:“区立职业学校”1所,学生317人;“县立职业学校”6所,学生1075人;“私立职业学校”2所,学生298人。^②又如在职业学校开设状况最差的山西,据伪华北教育总署总务局于1940年10月编制的“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和1941年12月编制的“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的各种图表,伪山西省政府辖区内的职业教育机构,1939学年度时还是一大空白,1940年度时才有“省立初级职业学校”1所。该校3个学级,126名学生,而且都是男生。^③但到1945年6月时,该省“现有职业学校六处”,其中仅1944年度设置者,就计有“雁门道立忻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东道立新

① 《冀东地区之历史·内政改善之现状》,《盛京时报》1937年(康德四年)7月10日。

② “冀东特别区三十三年度教育概况报告书(附:冀东特别区教育概况统计表)”(1944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1。

③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省市中等教育概况统计分表(山西省)”(1940年10月)、“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各省市中等教育概况统计分表(山西省)”(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21。

绛初级农科职业学校”和“太原市立初级商科职业学校”等三处。^①为了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其时职业教育开办的大概情形,现将日伪留下的比较齐全的1939学年度和1940学年度两年伪办职业学校的统计数据列表如次(见“表二”、“表三”)。

表二:1939学年度伪华北政权下职业学校概况表

项 目		国、省 (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学校数	男	7	1	9	17
	女	1		2	3
	计	8	1	11	20
学级数	男	31	1	54	86
	女	9		9	18
	计	40	1	63	104
学生数	男	914	23	1933	2870
	女	306	1	108	415
	计	1220	24	2041	3285
教职员数	男	180	5	232	427
	女	30		21	51
	计	210	5	253	468

^① “第五次教育行政会议山西省教育状况报告书”(1945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1。

项 目		国、省 (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全年经费数	男	240484.20	2760.00	256378.00	499622.20
	女	39775.00		16524.00	56299.00
	计	280259.20	2760.00	272902.00	555921.20

资料来源：“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概况统计总表”(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21。

表三:1940学年度伪华北政权下职业学校概况表

项 目		省(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学校数	计	3	10	13		2	2	9	2	11	26
	男	2	10	12		2	2	5	1	6	20
	女	1		2				4	1	5	6
学级数	计	20	50	70		7	7	33	27	60	137
	男	18	42	60		6	6	18	23	41	107
	女	2	8	10		1	1	15	4	19	30
学生数	计	418	1429	1847		188	188	748	2821	3569	5604
	男	390	1265	1655		166	166	572	2625	3197	5018
	女	28	164	192		22	22	176	196	372	586
教职员数	计	122	165	287		17	17	152	39	191	495
	男	97	164	261		17	17	117	35	152	430
	女	25	1	26				35	4	39	65

项 目	省(特别市)立			县(市)立			私 立			总 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高级 职校	初级 职校	合计	
全年经费	9704.20	3446.60	13150.80		15120.00	15120.00	28576.00	68911.60	34987.60	849458.40
数(元)	8918.41	3446.60	12365.01		15120.00	15120.00	28576.00	68911.60	34987.60	847872.61

资料来源：“二十九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概况统计总表”(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21。

二

在侵华战争期间，日寇为了将华北沦陷区改变成为他们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基地，实现其“日本工业、华北农业”的侵华战略目的，故在华北沦陷区于职业教育机构的开办类型上，明显呈现一种“偏科”状态，即偏重于农业职业教育，借以养成他们需要的农业技术人员。

前文已揭，早在伪冀东政权时期，其时冀东沦陷区所办理的唯一一所职业学校，即是初等农科职业学校。伪华北政权出台之后，在华北沦陷区办理极不景气的职业教育中，除平津二市外，其他各省所辖区域内的职业教育机构，无不以农业职业学校为主。如在1939学年度时，其时河北省有伪办职业教育机构4所，其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2校、初级工业职业学校1校，其他高级职业学校1校，然而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数是，2所农校计252人，1所工校仅24人，1所其他高级职校也只有56人，后二者合计之数不及农业职业学校学生的1/3；河南省伪办职业学校仅为1所，亦为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生130人；山东省伪办职业学校3所，其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初级工业职业学校各1所，学生数则分别为120人

和 80 人,另 1 所为高级商业学校。^①到了战争后期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职业教育偏于农科情状更为严重。如前引山西省,直到 1940 年时才有“省立”初级职业学校 1 所,而该校即是 1940 年 10 月设于山西太原成方街旧城隍庙的“山西省立初级农科职业学校”。^②后来该省在 1944 年一年间又设立 3 所职业学校,其中初级农业(或农科)职业学校就占其 2 所,另 1 所则为初级商科职业学校。又如在河北省,到 1944 年时,在其为数不多的伪办职业教育机构中,农业职业学校就占有 9 处之多。它们是:“省立邢台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北省燕京道联立顺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北省燕京道联立三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北省燕京道联立良乡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黄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沧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赵县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北省冀东道联立唐山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河北省津海道联立武清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此外另有“省立石门初级商业职业学校”1 处。^③其中于 1940 年设于邢台原省立邢台中学旧址的“河北省立邢台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学制为三年,招收高小毕业生,共 6 个班,分园艺、农作两个专业,课程除一般初中课程外,另有作物、园艺、肥料、土壤等“专业课”。^④不仅在农业社区,即使如天津这样以工商经济为主体的城市,伪天津特别市教育行政为“推进职业教

① “二十八学年度华北教育统计·中等教育”(1940年10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 2021(2),案卷号 21。

② “山西省第一次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实录·山西省立初级农科职业学校校长报告”(1941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 2021(2),案卷号 54。

③ “河北省咨送本省各道市县局处校所举办剿共讲演大会实况报告”(1944年1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 2021,案卷号 456。

④ 杨春茂:《邢台市教育简史》,政协河北省邢台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邢台文史资料》第 3 辑,邢台市彩印厂 1987 年 10 月印行,第 86-87 页。

育”，亦于1944年秋季成立了“天津市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内分畜产、土木和农艺农业等三科。^①

除了普通正规的职业教育机构偏重于农业职业学校的开办，日伪为了养成大批农事技术人员，还于其他学校不断地添加农科（农事）职业教育的成份。早在1939年伪华北政权召开“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时，就对农业职业教育加重了注意。在此次会议上决定要推广初等职业教育，并拟订注重实习办法八条，通飭各伪省市遵照规章各视地方实际需要情形设法推进，其中于农业职业教育尤有强调。1940年“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召开时，日伪再次就职业教育问题进行研讨。在此次会议上，伪河北省代表还拟请在伪北京大学的农、工两学院附设农、工职业师资养成所，借以养成农、工职业教育的师资。当年，伪华北教育总署还决定加大力度“施行农事教育”，指令“各级学校酌添农业科目，注重圃场工作，使学生从事于实际劳动”，在农业社区“更以学校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为中心，作出各种方案，联合乡镇公所及公私立农事机关，推行农事教育于一般农民”。^②1941年6月，伪华北教育总署“为集思广益以期推行农事教育之计划万全起见”，聘定所谓“农业专家”及伪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伪师范学校院长以及伪教育总署内各关系局长、科长等，成立了所谓“农事教育设计委员会”，拟定了“农事教育实施草案”及“试办农事教育学校补助费预算草案”等，意欲借此解

① “教育总署第五次教育行政会议天津特别市报告书”（1945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1。

② “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施政方针”（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决“养成农事教育之师资问题”。^①作为一种配套举措,当年10月伪华北教育总署还制定了“储备农事教育人员选拔委托生办法”,并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二年级以上学生,开始了所谓“农事教育委托生”的选拔。同时,伪华北教育总署还通令各省市伪教育厅局“注重生产教育”,筹设包括农业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种“职业补习学校”。随后不久,根据“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上伪河北省代表的提案要求,还赶在1942年春季在北京筹立了“农事教育人员养成所”,由华北沦陷区四省的伪教育厅考选高中及其同等学校毕业生,保送入所训练,“以造就农业师资”。除此而外,伪华北教育总署于加强农事职业教育方面,于1942年还作出了几项较大的举措,这就是选定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选定普通小学附设农业补习班,以及举办“农事教育人员暑期讲习班”等。^②至此可见,在普通正规的职业学校之外,伪华北政权于农业职业教育方面,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包括高等、中等及初等教育层次在内的各种类型农事或农业职业教育机构,现根据这些教育机构的的不同教育层次,分别稍加说明。

一是有关农事教育专业人员的养成。自1940年所谓“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上伪河北省代表提请设立培养农事教育师资人员机构以来,日伪即重视农事职业教育人员的养成。1941年10月,伪华北教育总署开始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农艺学系二年级以上学生选拔所谓“农事教育委托生”。此次选拔委托生,每年级4名,共

① “教育总署施政方针及实施概况”(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640。

②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640。

12名,在原习科目外,加授教育科目,并给予津贴。其中由四年级选出的4名委托生,到1942年暑期即按时毕业,并根据“农事教育委托生服务办法”,分往河北、山西、河南三省“服务”。第二批出校者,分往河北、山东二省“服务”。^①继选拔“农事教育委托生”之后,1942年春,伪华北教育总署又在伪北京大学农学院成立了所谓“农事教育人员养成所”,“以为将来农业学校师资之准备”,其培养目标为“中等学校农业课程教员”及“教育行政机关主管农事教育职员”。学生由冀、豫、鲁、晋四省伪教育厅就高中及同等学校毕业生考选保送。其中河北9名、山东8名、山西7名、河南6名,此30名学生“是为第一班学生”,学习期限二年。“所长”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兼任。当年5月12日即举行“开学典礼”。^②接第一班之后,1943年度又招有第二班,并“应农事教育需要”而“扩充”班次。^③随伪中央教育行政创办“农事教育人员养成所”之后,伪河北省教育厅亦筹设有“农业教员养成所”,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改组扩展为“农业专科学校”。1942年暑期时,伪华北教育总署又借伪北京大学农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华北农事教育人员暑期讲习班”,以此来“补充现任农事教育人员之学识,并促进其教学效能”。学生来源系由各伪省教育厅选派“农业职业学校”现任教员30人,学习时间共两星期,学习内容分特别讲演及农业科目二种,“尤注重精神训练及农事教学之实际问题”。到1943年暑期举办

① “教育总署三十二年度施政概要”(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② “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况”(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③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辑要(民国三十年度)”(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第二届时,训练时间与受训人数仍然是两星期和30人。^①除此等学校培训机构外,日寇为掠夺华北棉产资源,还于1939年时指令伪北京大学农学院与“华北棉产改进会”合组“植棉技术人员训练班”,借以“作育植棉技术人材”。^②到1943年时,在这种“训练班”的基础上,日伪即在河北邯郸设立了“华北棉产改进会邯郸训练所”和“邯郸县棉作专修学校”。其中“邯郸训练所”计有学生172人,其来源分别为河南50人、山西17人、保定18人、石门(今石家庄)17人、邯郸70人;“棉作专修学校”则为每期7个班,每班9人,计63人,在其办理三年间共计培训学员200余人。^③

二是于中初等学校教育中农业职业教育成份的添加。由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8月24日公布的“中小学暨师范学校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可知在华北沦陷区,无论对于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均应于“劳作科”中“授以关于农艺及工艺”之技能,将农业知识技能作为普通学校内的正常课程内容来传授。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为了加强华北沦陷区的“战时体制”下粮食生产和侵略战争食粮供应基地的建设,由伪华北教育总署的“农事教育设计委员会”作出决定,自1942年暑期后,于中等教育层次中“选定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于初等教育层次中“选定小学校附设农业补习班”。其中“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一项,“为慎重起见”,先由华北四省伪教育厅选定师范、中学各1处,共计8校,尽先添授,由伪华北教育总署补助经费,“暂

① “教育总署三十一年施政概况”(1942年)、“教育总署三十二年度施政概要”(1943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② “教育部二年行政摘要”(1939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441。

③ 阎国华、安效珍主编:《河北教育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33-334页。

作试办”。到1943年时,又于各省“各加选师范及中学各一校”,连同原选8校总计16校。到1944年时,据当年伪教育总署的“施政辑要”,在前此两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选”。这种于中等学校添授农业课程,其目的是“为养成学生勤劳习惯,并使其略具农业知识及技能,俾毕业后能实际从事农村工作”。^①至于“小学校附设农业补习班”,其目的乃在于“为培养多数实际从事农业工作之基础人才”,亦自1942年暑假后开始实行。其办法是由华北各省市伪教育厅(局)选定小学校20校,附设“农业补习班”一班,“招收小学校毕业生,施以农业补习教育”,故其教育程度相当于初级中学教育或初级职业学校,只是肄业期限为一年而已。这种补习班每班学生以30人为原则,其中河北、山东两省各选4校,河南、山西两省各选3校,京、津、青三市各选2校,同样由伪华北教育总署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1943年时,在原有的基础上,每省又增选同样的校数,计整个华北沦陷区开办这种“农业补习班”的小学增加到40校。到1944年时,在前此基础上,于各省市“继续增选”其校数。^②为了使这些农事教育的措施及项目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伪华北教育总署打着“明 各省市农事实办理情形以便督促改进”的旗帜,还派出相当人员进行督促检查。如1942年12月,即派出了伪北大农学院副教授朱延 等人,前往冀、豫、鲁、晋四省

① “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况”(1942年)、“教育总署三十二年度施政概要”(1943年)、“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辑要(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② “教育总署三十一年度施政概况”(1942年)、“教育总署三十二年度施政概要”(1943年)、“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施政辑要(民国三十三年度)”(1944年)、“华北教育总署检送1943年度华北教育施策要纲及其实施方案呈”(194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2),案卷号5。

及北平市等地“视察”，以及加强此类农事教育的办理。^①

三

在日伪统治下，作为奴化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虽说其开办目的是为了养成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但与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一样，日伪在这种学校中亦将日语日文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之一，让日本语文在职业教育的教学层面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华北沦陷区的职业学校里，日语教学，在课程内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从前列“表一”可以见其大概。而在此表所列之前一年即1938年北平地区正在办理的74所职业教育机构中，除了数所专授汽车驾驶技术、数所专习国画（传统中国绘画艺术）以及数所专授国术（传统中国武术）之类的职业学校外，其他很少有在“教学科目”中不设有“日文”或“日语”者，甚至连教会组织创办的“私立青年会英文夜学校”，也是日文和英文并设。而在所有开设有日文或日语课程的职业教育机构中，几乎均将日文或日语安排在仅次于“国文”的第二课程位置。至于那些诸如“北京市当业公会附设日语传习所”、“私立新民报社附设新民日语学校”、“私立大同日语补习学校”等以传授日语为目的而开办的职教机构，更是于“教授科目”中只列有“日文专科”。^②又如开设在河南开封的“河南省立开封初级农林学校”，该校开设于1940年，为开

①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640。

② 田红、李诚：《北京近代中师、职业、学前、特殊、民族教育史料》，北京教育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35-291页。

封地区沦陷后日伪开办的“第一所公立中等学校”。这是一所以普通中学教育为主的“戴帽”的职业学校,即于普通中学外加一个“高级班”从事职业教育。该班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常规中学的国文、修身及数、理、化、史、地等,一是农业职业学校教授的作物学、土壤学、育种学、园艺学、肥料学等,再就是作为必修课的日语。^①

正因为其时不少职业教育机构是以传授日语为其主要教学内容,借此授予求学者与日本人打交道并求得谋生的机会,所以其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就往往将各种类型的日语学校、日语传习所等教育机构,视为职业学校之一类。如设有青岛的“青岛日华女学院”,即是一所典型的教授日语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该校“以专收中国女子教授日语高等普通教育及女子必要之技艺而谋日华两国间之融洽为目的”,所收学生以中国小学毕业年龄在14岁以上之女子,或女子中学校初级部毕业生,或具有同等之程度者,其修业年限为两年,第一学年的“学科课程”,日本语每周为10课时,而中国语仅为3课时,第二学年的“学科课程”,日本语每周为5课时,而中国语仅有2课时,至于真正属于职业上之教育,则仅于“技艺”一项“授以打字必要之教育”。^②又如设在石门(即石家庄)的“石家庄新民会附设日语商业夜学院”,亦是一所典型的以传授日语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职业教育机构。该校名为讲授商业知识和技能,但日语教育几乎为其惟一的办学目的,所以早在1938年10月间,该校就派出了自己的“赴日学习”的留

① 吴凯:《开封沦陷期间的第一所中学》,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39辑,郑州大学印刷厂1991年8月印行,第169-173页。

② 《青岛日华女学院简章》,《青岛教育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40年4月30日)，“附录”第36-40页。

日学生。^①至于前引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调查科于1938年编印的《北京市各级中小学调查》，更是直接将各有关日语传习所或日语学校列作“职业学校”的类别之中，如“私立大同日语补习学校”等即是，又如“业余日文传习所”、“北京特别市国术馆附设日语传习所”等亦是。

此外，有必要介绍一下沦陷时期日伪在华北各地开设的“日语学校”或“日本语学校”。这类学校，并非是日本人为其在华北的移民或居留民子弟开办的学校，而是与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办理的一般中小学及师范学校一样，归属于伪华北政权治下的普通教育体系，以招收中国学子学习日语为主要课程和目的的教育机构。七七事变后，因日语日文用途日繁，日伪即在沦陷区各地纷纷办起了这种“以教授日本语文为目的”的学校。与普通的中小学相比，这类学校除传授日本语文外，在学制年限上一般是两年，而且其学生入校前都有一定的学校经历和学业基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培训性质。然则开办初期，这类学校比较杂乱，尤其学校教学水平和学生入学基础极不整齐，而且随着奴化教育的推进，各地公私立日本语学校日见增多，“内容既极复杂”，而且“名称亦不一致”。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于1942年2月拟定了《整顿日本语学校暂行办法》（17条），并于21日“以署令公布”。^②该“暂行办法”规定：为统一名称免除混淆，“所有以教授日本语文为目的之学校统称为日本语学校”，旧有学校名称分歧与此项规定不合者，限一年内加以改正，公立者称为某县某市或某省之日本语学校，私立者称为私立某某日本语学校，但后者不得以当地地名为校名；日本语

① 《石门日语学院保送留日学生》，《新民报》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10月10日。

②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1943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640。

学校修业年限定为一年以上,视环境需要可附设速成班;日本语学校应招收“完全小学校以上之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课程除日本语文外,并规定修身、国文、体育为必修科,但不满6个月之速成班得变通办理;日本语学校学生“以男女分班或分校为原则”,“以昼间授课为原则,但视环境之需要得变通办理”;“各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上级教育行政机关关于本办法施行期间内对于管内日本语学校应随时加以考查或视察”。^① 经此“整顿”后,作为一种特殊的职教机构,这类学校基本上成为中等教育层次的专门进修或培训日语的学校了。

与在课程安排和授教内容上重视日语日文的传授相同步,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机构于教育及管理上,同样也是由日本人所把持。日本人不仅常常“受聘”为各有关职业教育机构的教师,或充任其校长,甚至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即为日本人主持办理,故学校的一切由其操纵于手中。如前引开设于北平地区的“北京市私立新光学院”,该校“教授科目”仅有“日文专科”,其创办人即日本京都人氏田中武;伪新民报社附设的“新民日语学校”,其校长为日本人武田南阳;“中央铁路学院”,其院长为日本人小林铁太郎;“北京美术学院”,副校长为日本国立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的服部亮英,该氏于1938年冬接手校长后,将该校改名为“北京市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并于内部积极整理,引起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军部的注重,日军报导部部长川口氏还曾前往该校“参观”,并对其办学“成绩”加以赞赏。^② 又如1938年5月15日设在北平的“北京生活学校”,该校系由日本东京丰岛区目白町自由学园,“为图谋中国女性

① “整顿日本语学校暂行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教育总署档案”,全宗号2021,案卷号690。

② 《川口报导部长参观美术学校》,《新民报》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1月6日。

生活改善与依工艺之中日文化交流”而创办。该校除校长为日本人羽仁元子外,另由室军平氏令光子及该学园研究工艺所员5名女性,教授中国16-17岁的女孩以染色、机织等技术。在整个办理过程中,主办者一直视该职教机构“为日华两国人民融洽之机关”,故在教学过程中,名义上“以积极的开始改善中国女性生活方法与副业之彻底化”,实则力求达到下述“三项目标”,即共同学习两国语言、共同学习生活、共同学习技术,“以期两国人民互相达到真正之认识及亲密之感情”。^①再如前引设立在邯郸的“华北棉产改进会邯郸训练所”和“邯郸县棉作专修学校”,为了配合日本对华北地区棉花资源的掠夺,这两处职业教育机构,无论其所长、校长和教师,“全部由日本人担任”。其中“邯郸训练所”的所长,即是日本人吉史郎,全所教职人员50余人,其中教员都是日本人;“棉作专修学校”的校长,则由日本人岡田与作充任,内有教员30人,同样“全部是日本人”。^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日寇的控制与操纵下,华北沦陷区的职业教育,其中还有一种最为可恶且可耻的成份,这就是以兽兵为服务对象的妓女教育。如在伪青岛特别市,即于1938年7月1日,将原市立第一、第二两所女子补习学校进行“恢复”,“招生”对象主要是平康里、升平里的妓女。后来伪教育局又陆续在各妓院增设分校,其中第一女子补习学校设在青岛四方路,两所分校分别开于黄岛路和德盛路,第二女子补习学校设在青岛邱县路,两所分校分别开在冠县路和河北路。这些“补习学校”每日授课四小时,以修

① 《北京生活学校使华女性习得工艺以图中日文化交流》,1938年(康德五年)8月21日《盛京时报》;《由文化之提携联络中日感情 京生活学校日见进展》,《新民报》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2日。

② 阎国华、安效珍主编:《河北教育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333-334页。

身、国语、日语、算术、常识为其“主课”，另有“辅课”缝纫、烹饪、音乐、体育，其中日语是“聘请”日籍女教员讲授，目的是便利这些妇女“以应需要”。^①

(作者余子侠,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① 《教育工作报告》，《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0期（1938年8月15日），“计划及报告”第24-25页；孙新兴：《青岛沦陷时期的教育概况（1938-1945）》，《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5年第5期（青岛专辑），山东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10月编印，第92页。